

《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

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视觉史诗

王文杰

抗战文艺作品巡礼

“历史画家应当是‘传唱’历史的诗人。”曾创作了《英勇不屈》《井冈山》《娄山关》等一批经典历史画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全山石如是说。怀着“传唱”历史的雄心，2009年，79岁的全山石先生同他55岁的学生翁廷亮，历时两年合力创作了油画《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见右图）。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将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凝固为永恒的视觉史诗。

历史画创作有其独特性，它既须用精炼概括的艺术语言再现历史的真实，也须融入创作者的认知和情感，并通过高度的艺术提炼达到艺术的真实。确定主题思想，是创作重点。为此，两位画家收集了大量材料，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对主题思想进行了深入挖掘。他们意识到，作品要超越历史表象，不能从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出发，而应从《义勇军进行曲》何以被久久传唱这一命题中寻找内在力量。《义勇军进行曲》自诞生以来，始终激励着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团结向前，其中蕴藏的正是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因此，两位创作者摒弃以田汉、聂耳等历史人物来表现主题的传统思路，而从《义勇军进行曲》所彰显的民族精神入手，以象征手法实现破题。

歌词中的“血肉”“长城”“起来”“前进”等，既奏响时代强音，也为画家们提供了创作灵感。通过不断理解和感悟歌词意象，他们的构思逐渐清晰：以“血肉长城”为主要意象统摄画面。长城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用生命捍卫河山的爱国志士则以钢铁意志铸就血肉长城。两位画家将人物群像、雄伟长城与漫天



硝烟等意象相组合，使画面整体具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与象征的高度。

正如全山石先生所说，“创作这幅作品不能离开历史”。《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义勇军”，并非一支正式的军队，而是抗战时期人民自发

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力量。如何更好地刻画义勇军群像，彰显其精神伟力？两位创作者分析了美术史上大量经典之作，认为“团块化”是处理复杂画面最有效的办法。于是，他们借用前人智慧，把工、农、兵、学、商等不同阶层的爱

国志士组合成一个又一个团块，使画面构图更加灵动、空间更加丰富。近景处，八路军战士、民兵、群众等形象错落分布，众人目光坚定、姿态勇毅，宛如一道坚不可摧的铁墙，与远景处的长城相辉映，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中景处，浩浩荡荡的队伍则令静止的画面呈现出瞬间的动感。坚实的人物造型和巧妙的布局，不仅解决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的超时空表现难题，还有力展现了“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视觉主题，增强了画作的感染力。

对光影的艺术运用，也是处理复杂画面的有效手段。它可以隐掉细枝末节，让层次清晰，凸显主体。这件作品使用了大量光影手段，大大增强团块轮廓造型变化的灵活性，呈现出戏剧性效果。画面的色调处理也充满象征性。天空中大块黑色被一道红色划开，这抹红，是朝霞、是烽火、是热血，也是信仰。红色，曾多次出现在全山石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其蕴藏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整体来看，画面色调浓郁、对比强烈，既强化了战争的氛围感，又传递出人物不畏强暴的坚定信念。

音乐与绘画的交织共鸣，使《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旋律久久回荡。两位画家以色彩“传唱”历史，以精湛的写实技法、象征性的表现手法，实现了歌词意象的视觉化创造，成就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传承并深化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如今，再次赏读经典油画《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依然能感受到其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它以穿越时空的艺术光芒，持续照亮中华儿女的奋进之路。



和美边疆入画图

刘艳卿

这里有皑皑雪山，萃取天地灵气，融化汇聚成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这里有灼灼丹霞，采撷高原雨露，淬炼沉淀为斑斓厚重的大地华彩……如诗似画的边疆，在“和美边疆 民族同心——新疆西藏美术作品展”等展览上铺陈，带领观众走近艺术家心中生机勃勃的诗和远方。

博大宏阔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及深沉厚重的历史底蕴，为艺术创作提供着丰厚滋养，吸引一代代艺术家奔赴边疆，开启艺术新探索。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赵望云、叶浅予、董希文、艾中信、黄胄、方增先、靳尚谊、朱乃正、韩书力等一批艺术家，不断踏上西行之路，甚至扎根西部，以炽热的情怀对边疆展开深度挖掘与多维描绘，创作了许多经典之作，极大丰富了中国美术内容，拓展了艺术语言，为民族题材美术创作注入新活力。

边疆苍茫的原野、险峻的山川和浩瀚的戈壁，拓展着艺术家的空间感知力和审美表达力，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绘画语言抒写辽阔大地的沉雄气魄和人文意蕴。赵望云中国画《高跷天山》是其表现西北自然山川的代表作之一，作者通过写意之笔，描绘了新疆巍峨的山势和茂密的树林，牧民放牧的身影则为天山增添了生气。

不只是自然风光，边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多彩的人文风情亦是美术工作者热衷表现的内容，且在不同创作者笔下散发着不同魅力。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油画道路上的重要实践者，潘世勛一直以作品反映时代、表现生活、讴歌人民。自1960年起，他先后10余次深入藏区，深情描绘青藏高原的人文景观，《我们走在大街上》便是其结束近10个月的进藏生活后完成的经典之作。作品以当时广为传唱的同名爱国主义歌曲命名，通过表现一群藏族青年筑路工人放途中边走边唱的场景，生动展现新西藏建设者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吴作人中国画《戈壁行》则以另一种场景——骆驼队于荒寒戈壁中前行，彰显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艺术家的审美关照下，边疆不再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寂寥，而是闪耀着人文的魅力、发展的活力，更镌刻着民族团结奋发的力量。

艺绘边疆，弦歌不辍。新时代，随着兴边富民行动深入推进，边疆地区发展面貌为之一新，为艺术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一批批美术工作者相继深入边疆地区，用心感受边疆地区火热的生产、边疆人民美好的生活等，绘写边疆巨变的时代华章。在全国政协书画室、中国美术馆组织美术青年新创作的大型中国画《盛世新疆》中，多个民族的健儿们聚在一起，于碧草绵延的草原上策马扬鞭，好不欢快；在其组织创作的另外一件大型中国画《大美西藏》中，藏族人民载歌载舞，其乐融融。两幅作品正是对新时代“各民族亲如一家”的生动诠释与深情歌颂。

美术作品里的边疆，以万物和美、民族共进为底色，用鲜活的艺术语言展现着边疆的雄浑与丰饶、厚重与朴实，传递出“和美边疆 民族同心”的蓬勃生机。

（作者为西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上图为李丹油画《美丽新疆》（局部）。

开启跨越山海的艺术对话

李彦辰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内，来自五大洲133位艺术家的244件（组）作品，正在开启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对话。“流动的艺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国际艺术交流研究展”以美术史为基本线索，试图通过自有馆藏勾画近代世界美术发展面貌。

在中国的美术馆界，国际艺术收藏一直是小项，学界对于馆藏国际作品的艺术水平也略乏信心。但无法忽视，在当代社会，收藏、展示世界艺术经典，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反映美术馆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因此，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决心以几十年来积累的上千件国际艺术藏品为基础，策划专题展览，以全球视野思考艺术发展之路。

展览的作品构成体现出一种独特性——多国艺术作品的汇聚暗藏着近代中国认识世界的线索，反映出从中国看世界的历史眼光。这种眼光最早投向欧洲，展览中以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所绘《妇女头像》为代表的批欧洲油画，系20世纪30年代由北平研究院最初收藏，体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公立研究机构的艺术倾向；50年代，我们的目光转向苏联和亚非拉友好国家的艺术；改革开放后，更多地关注于现代主义各流派艺术；21世纪以来，摄影艺术、装置艺术、影像艺术等新鲜多元的艺术形式得到重视。这样一条线索在展览现场的呈现，折射出美术作品收藏史与中国百年世界文化接受史之间的内在联系。展览中出现的很多国际艺术流派及艺术家，都曾是国内艺术家学习和参考的对象，对中国美术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其中也可以看到，100多年来中国的国际艺术交流是在兼收并蓄中不断拓进的。

近代中国也同样受到世界的关注。国际艺术家在中国旅行时创作的作品，体现了从世界看中国的眼光，也成为本次展览的一个亮点。法国的阿涅斯·瓦尔达和马克·吕布，是新中国成立后来华的摄影师，他们将镜头对准人们生活中的平凡场景，关注古老中国与当代中国之间的碰撞与对话，在创作中寄托着对中国的深厚情感。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了解中国在世界眼中的形象。

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质差异性极强，但美的规律是相通的。纵观世界艺术史，中国瓷器艺术与法国洛可可艺术、日本浮世绘与欧洲后印象派、非洲原始艺术与欧洲立体主义艺术，皆存在不浅渊源，说明了国际艺术交流的重要意义。来自异域的眼光能够带来新的发现，开放、互鉴、交融也正是艺术焕发生命力的因素。

美术馆的国际艺术收藏之路还很长，“流动的艺域”展览只是一次初步的探索。期待将来，中国观众可以在家门口领略自有收藏的、更为完整的世界艺术经典。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典藏部主任）

下图为“流动的艺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国际艺术交流研究展”现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供图



蒙山高 沂水长

崔文涛

我的外公张万春，是鲁中乡间的一位普通老农。抗战后期，年轻力壮的他是齐鲁大地千千万万支前民夫中的一员。许多年后，当我从研究地域美术史、策划美术展览的角度，逐渐开始接触山东的红色主题美术创作，看到一件件描绘红嫂救伤员、全民大生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作品时，遥想起外公小腿上于支前过程中留下的褶皱，越发真切并具体地认识到在老一辈山东人中，“军民鱼水情”这5个字写得是多么普遍和深刻。这也促使我策划了“蒙山高 沂水长——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暨‘传承弘扬沂蒙精神’主题美术作品展”。

抗战时期山东军民鱼水一家亲，以沂蒙地区最为典型，艺术家们也自然而然地将画笔对准沂蒙。在各地创作中，虽然艺术家们的表现方式各异，但情感投射高度一致，以深刻的主题性和鲜明的艺术个性，传递着军民鱼水情深。

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抚育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沂蒙女性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也是艺术家表现的重要对象。单应桂中国画《沂水欢歌》（见上图）等作品，以写实的技巧展

现女性的柔美、自信和质朴，通过“洗军服”等细节巧妙点出爱党爱军主题。陈毅同志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表现沂蒙人民支前行动，艺术家们各有所思。陈国力、吕建军创作的油画《丰碑》，将斑驳沧桑、象征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手推车置于群山之巅，一览众山小，以强烈的象征性赋予支前史诗般的宏伟意象。

随着时代发展，艺术家们不断深耕沂蒙精神。在尺幅巨大的中国画《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沂蒙丰碑）》中，李学明用写意的绘画语言，对300多名军民学习、生产、训练、运输的场景展开全景式描绘，让激情燃烧的岁月在画纸上艺术重现。

一件件作品或优美或雄浑，或直抒胸臆或曲径通幽，是艺术家们走遍沂蒙山山水水，深入历史现场、深刻研究史实后反复锤炼的结晶。如今，这些作品成为被观察、被研究的样本，为沂蒙精神写下生动注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故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却在新一代代艺术家笔下得到传承和弘扬。

（作者单位：山东美术馆）



临漓滴水湖畔，上海天文馆主建筑以优美的螺旋形态模仿天体运行轨道，使参观者在入馆前便能感受宇宙的奇妙。

馆内，圆洞天窗、倒转穹顶和球幕影院成为建筑的三大亮点。圆洞天窗之下的光线流转、球幕影院外圈的光环盈亏，带领人们探索时间的奥秘。为营

造置身宇宙般的沉浸感，整个天文馆的混凝土和钢结构几乎都采用不规则形状，流畅的弧线宛如恒星的运动轨迹。设计团队通过对建筑尺度、形态与光影的巧妙设计，为人们感受星空、理解宇宙、思索未来打开新的窗口。蔡如娃摄



中国画《新荷》，作者刘巨德。



草木葳蕤，万物并秀，阵阵蝉鸣奏响大自然的乐章。自然的变化启发着中国人的文化认知，这在绘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以蝉入画就是其一。

最初，蝉在传统绘画中的文化意象约略为两种：一种是唐代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声悠长而嘹亮，传递出自信之感；一种则是唐代李商隐的“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蝉声孤寂而清逸，抒发着落寞之情。后来，蝉又多了一些“禅”味，与多变的笔墨相融，耐人寻味。

对画家而言，画蝉不应止于写实，而需体会其中蕴藏的文化精神，才能开辟画之新境。譬如，明代沈周《卧游图》册中有《秋柳鸣蝉》，描绘了一只趴在柳枝上的墨蝉。此蝉虽没有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中刻画得那般栩栩如生，然其神似之韵丝毫不减。沈周在画上题诗曰：“秋已及一月，残声绕细枝。因声迫耳质，郑重未忘诗。”意即虽已入秋，但掩映在绿树中的鸣蝉却没有焦虑，还在继续自己的吟唱，仿佛已经步入老年的诗人，犹自不能忘记诗歌所以存在的意义。由此，笔墨超越了现实，成为文化精神的延续。将相同的文化精神融入创作，不同时代的画家便有了跨越时空对话的可能。清代李麟《花鸟十二

静听画中蝉鸣

陈文璟



开之《蝉》中，一样是柳树与蝉，李麟画得更潇洒清爽。画家虽在画上抄录了李商隐的《蝉》，却忽略了原诗传递出的伤感之情，并题曰：“夏六月，溽暑蒸人，偶写高柳鸣蝉，觉有清凉之气。”他画的显然是当下的心境，而心静体凉，本是自然之义。

近代以来，画蝉者中不乏名家，比如齐白石、王雪涛、唐云等。白石老人曾言：“学画五十年，惟四十岁时戏捉活虫写照，共得七虫”，可知其笔下的工细草虫源自现实观察。白石画蝉，多配以写意花卉，呈现出工写结合之趣。但更多的画家要么追逐写实，一味写生；要么追逐意象，一味写意，很少有人能超越当下，升华自己的精神，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花鸟画创作。这提醒着今天的美术工作者，不能只追求技艺的提升，而忘记了绘画的初衷——对情感的抒发、对生命的感悟、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静听蝉鸣，不只靠耳朵，更要靠真诚的心，继而在创作中使写实与写意合而为一，实现对花鸟画传统的超越，蝉声才可以穿透画面，或嘹亮悠远，或高妙清凉。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上图为齐白石中国画《蕉叶秋蝉》。